

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

聂嘉琪

摘要: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立足于哲学—经济学视角, 阐明了资本对劳动个体生命时间控制和剥削的内在机制, 解答了资本运动的“时间之谜”。随着资本主义数字化转型, 数字资本的时间剥削呈现出多元形态, 既采用精准化管控、碎片化占有、界限模糊化等新方式加大对劳动时间的剥削, 又通过数字劳动加强对“数字技工”“数众”等不同主体的闲暇时间剥削。数字资本从时空维度重构了生产时间, 数字权力从社会时间等维度对时间体系进行系统规训, 共同构成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双重驱动力。要破除时间剥削困境, 必须大力解放和发展数字生产力, 变革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建构数字社会主义时间范式, 真正实现人类社会的自由时间解放。

关键词: 数字资本主义; 时间剥削; 劳动时间; 闲暇时间; 时间解放

中图分类号: A811.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5)02-0001-12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50110.001

美国学者丹·席勒 (Dan Schiller) 指出, 数字资本主义即“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 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1] (P5)}, 但数字资本主义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世界所固有的矛盾, “数字化时代只不过是让资本主义的矛盾完成了现代化而已”^{[2] (P241)}。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 数字资本以数字技术为增殖工具, 驱动社会结构加速变革, 将社会时间结构强行纳入增殖轨道并加以重塑, 以契合其持续扩张的需求。随着社会的加速运行, 个体的自由时间不断被蚕食, 社会的时间结构亦被深度扭曲, 成为数字资本增殖的附庸, 由此衍生出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现象, 这一现象成为理解数字资本主义复杂运行机制的关键维度。深入研究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问题, 有助于剖析数字资本如何通过时间的操控, 隐秘地转移价值、积累财富, 揭示其在看似自由与创新的数字经济表象下的剥削实质。

当前, 学界对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邓观鹏等^[3]认为时间资本化是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核心, 并从数字劳动对“产—消”时间的溶解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时间剥削的形态变构, 提出时间解放最终离不开数字社会主义的实现。于天宇^[4]从平台资本主义批判角度入手, 提出平台的资本化造成资本对主体闲暇时间的剥削, 无酬的数据生产劳动充斥着主体的日常生活。陈道武^[5]从数字资本主义批判视角出发, 提出时间重构、时间加速、时间自由分别是数字资本主义剥削的新形式、数字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新途径以及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幻象。郭浩哲等^[6]从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表现形态及其超越等角度入手对时间剥削进行了深入解读。

综上, 已有成果初步探讨了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形态变构等问题, 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帝国主义批判与国际数字治理中的中国话语权研究”(23&·ZD014)

作者简介: 聂嘉琪,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njq1998@stu.pku.edu.cn (北京 100871)

要借鉴。但目前关于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仍有待深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律的“原本”，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其科学性体现在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进行系统分析，并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其基本原则主要体现为坚持唯物辩证法原则、劳动价值论原则以及剩余价值论原则等，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律奠定了科学基础。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才能够揭示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真正本质与内在逻辑，并完成对时间剥削的批判。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从时间剥削的控制逻辑、多元形态、双重驱力等角度入手，对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尝试分析数字资本主义如何完成对人类的时间剥削，并基于此批判路径，探索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解放进路，在此基础上探讨人类实现自由时间解放的可能性。

一、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控制逻辑

时间作为马克思构建其理论体系的重要范畴，贯穿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对资本的剥削权力和增殖机制进行了基于哲学—经济学视角的批判性研究，逐渐建构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观，即将时间问题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来研究，探讨时间如何从人的积极存在方式转变为服务资本增殖需要的抽象的量；资本主义时间剥削具备何种独特性；资本如何提高劳动效率等方式进一步对劳动时间进行剥削和奴役；资本的时间剥削如何造成劳动者生命时间的异化。随着资本主义数字化转型，数字资本的时间剥削在不同维度表现出新特质。考察当今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形式，首先要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对资本与时间内在关联的阐述。马克思对资本时间剥削控制逻辑的批判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来阐述。

第一，资本家因资本增殖的需要把时间视为一种抽象的可被测度的量。当资本主义以成熟的商品经济形态出现时，商品交换的普遍化成为资本运动的社会历史条件。“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7] (P8)} 商品中蕴含着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形式，使用价值以某种有用性代表着财富的外在形式，而价值中蕴含某种同质的东西，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7] (P51)}。什么是劳动？马克思把劳动理解为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类的“生命活动”，通过这种形式能够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于客体事物之中。在劳动过程中，时间作为人的积极存在方式而存在，“劳动时间，即人类活动本身的直接定在”^{[8] (P270)}。此时，能够发现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劳动和作为资本增殖条件的劳动出现了对立性矛盾，即对于劳动者来说，劳动时间是他对自身存在的确证和本质力量的发挥，而对于资本家来说，劳动时间不过是为了资本增殖而存在。在商品生产中，对商品价值量的衡量依赖于其中所蕴含的劳动量，而对劳动量的衡量就进入到劳动时间的范畴之中，“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做尺度”^{[7] (P51)}。由此，资本家一定会把劳动时间作为一种可被衡量的“量”以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价值运动及劳动时间的出现，意味着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实质规定性的诞生，“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7] (P92-93)}。此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现在已经不用再谈质量了。只有数量决定一切”^{[9] (P97)}。

第二，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具备独特性，即资本主义时间剥削以工资形式掩盖了剥削本质，呈现出更为隐蔽的剥削方式。追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剥削现象伴随着私有制出现而发生，主要包括奴隶制剥削、封建制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其区别在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不同以及由此决定的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不同。奴隶制剥削建立在奴隶主完全占有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同时奴隶主完全占有奴隶人身及其劳动成果，支配奴隶的所有时间，奴隶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以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完全人身占有为基础。封建制剥削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即土地，而农民则不得不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向地主缴纳地租并承担徭役等义务，其劳动时间由封建主支配，农民与土地的结合以农民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为条件。资本主义剥削以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为基础，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以劳动者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为基础，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变成雇佣劳动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生产资料和货币采取资本形式，资本家既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又拥有对雇佣劳动者的支配权，并凭此实现对全部劳动产品的占有和支配，从而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同奴隶制剥削和封建制剥削不同的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占有，也不是人身依附，而是基于劳动者人身自由基础上的“平等”关系。美国学者罗德尼·佩弗（Rodney G. Peffer）提出，马克思把雇佣工人创造剩余价值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过程作为经济剥削，主要指“强迫的、无酬的、剩余的劳动，其产品无法被直接生产者所控制”^{[10] (P158)}的强迫剥削，鲜明构成资本主义剥削的基本特征。其一，强迫性。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价值实现维度看，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以各种形式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劳动者为了生存，必须依靠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与劳动时间为生。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已然决定劳动者的劳动并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其二，无酬性。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价值占有维度看，处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劳动者首先要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再生产自身的劳动力价值，其次在剩余劳动时间中为资本家生产出超出劳动力价值补偿点的价值，而后者则通常以所谓利润的形式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者在此过程的劳动为无酬劳动，反映了资本家与工人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其三，剩余性。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价值生产维度看，劳动力商品在使用价值上具备的突出特点是它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源泉，在消费过程中能够生产出比劳动力价值更大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劳动者利用剩余劳动时间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被称为剩余劳动过程，这一过程同时是价值增殖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环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作为购买者出现于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劳动者将自身的劳动时间作为商品出售给资本家，资本家则以工资形式购买此商品，赋予资本雇佣劳动以等价交换的“平等”色彩，似乎工资等价于劳动者所创造的全部价值。马克思对这种所谓的“等价交换”进行严厉批判，他指出，“剩余劳动或剩余时间是资本的前提”^{[11] (P82)}，“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隐蔽形式”^{[12] (P441)}。换言之，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值，而非劳动的价值，工人在劳动中所创造的价值要远远高于从资本家手中所获得的价值，而他在劳动时间内通过劳动所创造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剩余价值则被工资所表现出的“等价交换”意涵掩盖，资本对劳动者的时间剥削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呈现出来。

第三，资本家通过提高效率和改进技术等方式加强对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剥削。其一，从生产过程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生产剩余价值的两种方式。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日的方式增加剩余劳动时间以提高剥削率，这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随着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型，资本家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方式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以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这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单个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越少，他能提供的剩余劳动就越多”^{[7] (P587)}。其二，从消费过程来看，生产出来的商品中蕴含资本家预付的资本和劳动者无偿生产的剩余价值，这一价值实现只有在商品出售后才能实现，即商品必须被消费才能完成剩余价值的榨取。同时，资本是在运动中增殖的，因而必须不断地、周而复始地循环，才能不断实现剩余价值的再生产。马克思将这种资本的运动及其循环过程称为资本的周转。当每次资本周转所带来的剩余价值一定，资本家必然要求通过提高效率等方式缩短周转时间以提高资本

周转的速度，流通时间越趋近于零，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增殖量就越大。其三，从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的关系来看，生产时间包含劳动时间，资本家试图不断缩短生产时间以榨取更多剩余价值。商品的生产离不开劳动时间，即劳动者利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时间，但商品的生产时间不仅仅包括劳动时间，还包括受自然过程支配的时间。如葡萄酒的酿造，由人们的劳动完成葡萄汁的制作及其与酵母的融合后，仍需要一个发酵时期与存放时期，后者是不包含劳动时间在内的生产时间。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资本家必然通过改进技术等方式不断人为缩短生产时间，以榨取更多剩余价值。

第四，资本的时间剥削造成劳动者生命时间的异化。生命时间指的是人用来成长、发育等生理时间，以及用来提升自我生命活动质量的自由时间。资本通过剥削劳动的方式来榨取剩余价值，这一过程对于资本来说，是价值运动的增殖过程；而对于劳动者来说，则是生命时间的异化过程。其一，劳动者生命时间异化为生产时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增殖需求不断吞噬工人的生命时间，将工人的生命时间异化为资本增殖所需的生产时间。在资本逻辑统摄的时间中，工人不过是“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12] (P70)}，他们出于生存需求，不得不将大量生命时间异化为生产时间，以此获得作为一定量活劳动的价值的工资进行谋生，他们付出自身的劳动能力并非为了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而是为了满足作为生物的本能性生存活动。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7] (P605-606)}。其二，劳动者生命时间异化为规训时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被要求遵循资本家所设定的生产秩序进行劳动。资本家出于对效率和成本控制的考量，实行按时计量和计酬的工资制度，进而对工人的工作时间予以精确化、规律化管控。同时资本家通过“泰罗制”和“福特制”等典型生产管理制度，对工人在生产流程中的机械动作进行标准化规定，全方位达成对工人的时间规训。其三，劳动者的生命时间异化存在向生命时间本质复归的可能性。工人生命时间的异化主要源于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8] (P723)}。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工人生命时间的异化，必须“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8] (P574)}，才能消灭这种异化现象。马克思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3] (P532)}。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消亡，一种全新的时间格局得以开启，生命时间将从被异化的困境中挣脱出来，不再遭受生产时间的无度侵占和规训时间的严苛束缚。生命时间将回归其本真状态，成为个体积极主动实现自身价值的载体，实现向其本质的真正复归。

总体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时间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即时间必须被视为抽象的可被测量的量才能够存在于该生产体系中，同时指出资本主义时间剥削具备以工资形式掩盖剥削本质的独特性，通过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等方式增强对工人的剥削，从而造成劳动者生命时间的异化。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消灭后，时间才能重新成为人的积极存在方式，并为人们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奠定基础。

二、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多元形态

马克思对资本时间控制逻辑的重要阐述为当今理解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随着数字资本和数字技术的结合，作为资本主义当代形态的数字资本主义出现，“数字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以数字平台和一般数据为基础的新型资本主义”^{[14] (P19-20)}。数字资本主义按照自身特性对社会原有时间结构进行解构与重构，在此过程中既保留了时间剥削的控制逻辑，又重构了时间剥削的具体形态。一方面，马克思所说的控制逻辑没有变。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数字资本仍然将时间作为抽象的量进行衡量，同时具备时间剥削的独特性，通过时间规训等方式

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榨取数字剩余价值，使人的生命时间异化愈发严重。另一方面，数字资本的时间剥削形态更加多元。社会加速强化了对劳动时间的剥削，使劳动时间呈现精准化管控、碎片化占有、界限模糊化等特征，构成数字资本对劳动时间的显性剥削维度。此外，随着科技发展与劳动工具数字化，资本逐渐摆脱对物理空间的依赖，通过数字劳动将人们的闲暇时间资本化，构成数字资本对闲暇时间的隐形剥削维度。劳动时间、闲暇时间都转换为数字资本控制的对象，构成时间剥削的多元形态。

（一）显性剥削：社会加速强化劳动时间剥削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以革命的方式实现了社会历史观变革，他们将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视为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由物质劳动和机器主导的大工业生产模式向数字化生产方式转型。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两个绝不会”规律，资本主义转型一方面证明资本仍然蕴含着尚未发挥完全的生产力要素，另一方面说明资本想要维系统治权力就必须不断地对自身进行革命，“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5]（P34）。与此同时，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代表人物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站在社会批判理论的立场上，从社会现代化这种不断更新迭代的趋势中抽象出了一种新的解释——社会加速。罗萨认为，想要在现代化历程中把握当代社会的实质，需要回归到社会时间结构中对新异化形式进行时间诊断。

罗萨认为，现代社会由一种严密的时间体制所管制、协调与支配，这些时间结构又被社会加速逻辑所支配。他所关注的不是客观的、机械的、可被计量的物理时间，而是资本主义统治要求下所必须适应资本增殖需要呈现出人的生命时间。在现代社会中，以竞争为基础的经济逻辑和以虚假幸福为期许和承诺的文化逻辑造成“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步调加速”^[16]（P13）三种形式。科技加速提升了生产、消费和信息传播等过程的效率，改变了社会的“时空体制”，时间逐步被压缩；社会变迁加速改变了社会群体的社会时尚、生活风趣、惯用词汇等，作为“当下”而存在的时间区间不断萎缩；生活步调加速造成了生命时间的极度匮乏，科技水平的提高不仅没有增加主体的自由时间和降低生活步调，反而不断造成了主体的时间焦虑和许多无意义的忙碌。在以上加速社会表现形式的分析中，罗萨得出了一种非常怪异却又能体现出时间异化本质的结论：社会加速和社会停滞的时间悖论症状，罗萨将其比喻为“快速的静止”。换言之，在社会历史、生命时间和日常实践中，加速的体验总是不断转向它的截然相反的对立面，社会变化的加速和社会发展的停滞同时出现。加速社会改进技术和采用更先进的时间规划以节省时间，但同时人们省下越多的时间，人们所拥有的时间就越少，导致人们不得不持久地加入对各种资源的竞争追逐，由此造成人与空间、时间、自我等的全面异化和社会发展的停滞。从社会加速角度来看，数字资本对劳动时间的剥削展现出新特征。

其一，劳动时间精准化管控。平台是数字资本主义的基础设施，连接起劳动生产者、供应商、广告商等群组。数字资本主义利用平台这种中介形式将各主体纳入数字界面中，将其活动统一数字化和数据化，数字资本主义通过平台提取和使用数据这种特殊的原材料。同时，作为一种中介，平台不仅可以获得更多数据，还可以控制和管理游戏规则。在数字管控和平台规制中，掌握权力的资本家能够通过算法等技术手段将数字劳动时间精准化，通过此种“数字监工”方式建构起严密的时间监控模式，以精准时间控制的方式加强劳动强度以提高生产效率。

其二，劳动时间碎片化占有。在加速社会中，资本主义仍然“将价值作为一种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凝结”^[17]，通过碎片化占有劳动时间以获取更多价值。具体来看，数字资本通过信息技术把集中于物理空间的大规模生产众包、外包、分包于各外部系统中，这样能够掌控市场内外部资源流动和信息传递，以减少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时间耗费。在此过程中，数字资本增殖产生并依赖于“网络效应”——参与的用户越多，数据就越容易被生产且更有价值。这种生产过程带来的是对

不同层级、区域和模块劳动者碎片化时间的占有和剥削，如松冈真宏所言，“现在，过去这种‘大块时间’有价值、‘碎片时间’无意义的模式已经被改变。智能手机的问世使偶然获得的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碎片时间’获得了生命，使它们开始作为有意义的时间大放光彩”^{[18] (P21)}。

其三，劳动时间界限模糊化。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是对海量数据的占有，并以此来进行谋利活动。在数字时代，人们必须经由广告、电视、网络等信息传播手段参与到日常生活中，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大量数据，由此将生命活动中的大量休息和娱乐时间转换为劳动时间，工作时间的休憩和休息时间的间歇等都成为劳动时间的延续。而数字资本对休息时间的占有弥漫在数字劳动者生命时间的全过程中，以数据生产为剥削形式的资本运动进一步“模糊了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的界限”^[19]，数字劳工在各类生命活动中都在不断生产数据以为数字资本增殖创造条件。

在数字时代重新思考资本与时间的关系，理解和把握罗萨以时间诊断为核心的社会加速观将对进一步剖析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形式有所助益，时间确实在现代社会中成为组成社会结构和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罗萨构建理论的出发点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但其分析过程很大程度是就社会表象进行的客观性分析，而没有在资本逻辑中展开对现代社会和时间结构的诊断。在数字资本主义中，资产阶级在社会加速的语境下要求把节省的生命时间重新转化为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由此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剥削手段和表现，如闲暇时间剥削。把握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时间规制，才能对资本的时间剥削逻辑作出根本意义上的阐释。

（二）隐形剥削：数字劳动深化闲暇时间剥削

数字资本的增殖本性要求实现劳动者必要劳动时间向剩余劳动时间的转化，实现劳动者剩余劳动时间的最大化。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资本试图通过数字劳动资本化人们的闲暇时间，将其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并纳入数字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资本家无限剥夺在线用户的闲暇时间”^[20]，一种“‘劳动—休闲’的新场域”^[3]由此建构，人们的闲暇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社会成为巨大的“数字化‘移动工厂’”^[21]，人们于无意识中受到数字资本的隐形剥削。

数字劳动是随着数字资本主义发展而出现的新型劳动形态。2000年，蒂奇亚纳·泰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首次提出“数字劳动”一词，她提出“数字劳动”是“免费劳动”，认为在数字劳动中“自愿和无酬并存、享受和被剥削并存”^[22]。泰拉诺瓦之后，安德里亚·福马加利（Andrea Fumagalli）等认为数字劳动是一种超越传统工资关系的新剥削形式^[23]。在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看来，数字劳动“包括了关于数字媒体的存在、生产、传播和使用所需的所有形式的有酬及无酬劳动”^{[24] (P387)}，它“是一种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24] (P387)}，是“由相互铰接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组织方式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形成的”^{[24] (P387)}。综合以往学者相关观点，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上对数字劳动范畴进行把握：广义的数字劳动，是关于数字媒体存在、生产等所需的所有形式的劳动，囊括雇佣制下的有酬劳动及非雇佣制下的无酬劳动；狭义上的数字劳动，指“数众”在互联网上进行的各种休闲劳动，如浏览、点击活动等，主要指非雇佣制下的无酬劳动。数字资本通过前者，即广义的数字劳动深化对闲暇时间的剥削，既包括对雇佣制下的“数字技工”的剥削，也包括对非雇佣制下的“数众”闲暇时间的剥削，但这种剥削更加隐秘化、无形化。数字资本主义对闲暇时间的剥削呈现出如下两大表征。

一是雇佣制下的“数字技工”的闲暇时间所受剥削程度呈加剧态势。“数字技工”主要指数字平台直接雇佣的负责平台建构、研发、维护等工作的数字技术人员。“资本剥削的生产性劳动时间一方面包括有薪酬的员工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包括用户花费在网上的所有时间。数字媒体企业为第一种类型的知识劳动者支付薪水，但是用户生产的数据却被平台无偿使用和销售。”^{[24] (P140)}就雇佣制下的“数字技工”而言，其被剥削程度不仅没有随着技术革新得到缓解，反而日益加深。移动手机、计算机等数字设备的便捷性不断拓宽其工作场域，压缩其闲暇时间，并赋予闲暇时间

与工作时间互转的可能性，模糊闲暇时间与工作时间的鲜明界限，逐渐实现“数字技工”闲暇时间与工作时间的归融。“数字技工”于闲暇时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则通常不计入其工作时间，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转化为数字资本主义体系再生产的资本积累原料，无形中加剧其被剥削程度。

二是非雇佣制下的“数众”的闲暇时间遭受剥削。“数众”是数字平台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与数字平台不存在雇佣关系的数字化公众。数字平台以其智能化、数字化、趣味化等特征吸引数以亿计的“数众”聚集，并在此过程中对“数众”的生活方式与娱乐方式进行重构，日益占据“数众”的闲暇时间，并主要从两个方面对“数众”进行剥削。一是对“数众”创造的数据进行占有与剥削。“数众”依托数字基础设施，在数字平台进行冲浪、浏览等活动，并于无意识中不断生成维系数字平台发展的核心要素，即数据。这些数据是数字生产资料，具备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却被数字资本无偿占有。资本家利用这些数据，将这些数据进行整理、加工，提取出“数众”个体与集体的喜好与习惯等，将其作为具备使用价值的数据商品出售给其他资本家，从中攫取海量剩余价值。“数众”的劳动成果即数据不归“数众”所有，反而作为数据商品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并沦为数字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工具。从这一意义而言，“数众”受到剥削。二是占有“数众”的注意力资源并进行剥削。在数字时代，数字平台以流量作为判断其规模与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巨额流量意味着巨额利润，这决定了数字平台必须抢夺“数众”的注意力资源，使“数众”的注意力更多停留于平台之上。因此，数字平台通过制作海量内容吸引“数众”的注意力，力图充分占据其闲暇时间，并通过向“数众”不断投放定向广告等方式将其转化为实质利润，从而实现“数众”的剥削。“一个平台拥有的用户越多，广告费率就越高。”^{[24] (P140)}在此过程中，“数众”的注意力资源被数字平台占有并为数字平台带来巨额剩余价值。一些“数众”固然在此过程中收获了放松感与满足感，但这并不能遮蔽其注意力资源被数字平台攫取并转化为剩余价值的事实。正如福克斯所指出的：“积累的策略之一就是给用户提供免费的服务和平台，让他们生产内容并积累大量的产—消者，然后将这些作为商品出售给第三方广告商。产品没有卖给用户，但是用户却被作为一种商品出售给了广告商。”^{[24] (P140)}

总体来看，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都成为数字资本的控制对象，构成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多元形态，这同时标志着数字资本对时间的占有与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马克思指出，“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25] (P108)}，都是人类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人类通过时间这一物质的基本存在形式不断确证自身的实体存在。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语境中，数字资本以一种全方位渗透的态势深入社会时间架构，个体时间呈现出表象的自由化特征，实则深陷资本的隐性剥削罗网，于无形之中持续遭受资本权力的重塑与宰制，沦为数字资本增殖逻辑的附庸。

三、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双重驱力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资本愈发强化对时间的剥削与控制，“资本的时间管理，本质上……是实现自身增殖和维持剥削关系”^[26]。时间剥削作为数字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关键表征，呈现出极为隐蔽且复杂的运转势态。然而时间剥削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数字资本的多重运作紧密相连，时间重塑和时间宰制构成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双重驱动力。其中，时间重塑是时间剥削的具体实践手段，通过改变时间结构和利用方式，不断延长生产时间与剥削时间，从而最大限度实现数字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而时间宰制为时间剥削提供权力基础和方向指引，对时间体系进行系统规训，确保其完美契合数字资本增殖要求。

（一）时间重塑：数字资本对生产时间的时空再造

数字资本是“数字技术和‘一般数据’的资本化和价值增值化”^[27]，具有强大生命力与偏向性，试图将一切主客体资本化，作为其实现增殖目标的工具。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资本转向锚定生产时间，以持续重构的方式从时空维度完成对生产时间的再造。

时间维度上，数字资本通过柔性管理等策略径直延展生产时间跨度。马克思指出：“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7] (P306)} 数字资本的增殖本性要求其不断延长生产时间，以最大限度获取剩余价值。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大众批判意识的普遍觉醒，强行延长工作日、提升劳动强度等生产手段难以为继，数字资本自觉进行阶段调适，深度重塑生产时间结构，通过改良生产环境等柔性管理方式延长员工的生产时间。如谷歌公司主动提供较为优越的工作环境，并提供相应加班补助，号召谷歌员工自愿加班，并营造加班气氛，以此柔性延长员工生产时间。受此影响，一些谷歌员工为了最大化工作效率直接睡在公司，甚至能做到“一周工作130个小时”^{[24] (P300)}。此外，数字资本利用数字平台的便捷性与智能性以柔性延长用户生产时间。用户在数字平台的时间同时是为资本家生产数据商品的时间，因此数字资本通过对数字平台进行控制，利用各种算法权力与机制促使用户在数字平台的逗留，竭力延长其“在场时间”，使用户成为“产—消”者，既是数据的生产者，又是数据生产内容的消费者，推动用户不断延长生产时间，进行数据生产，从而使数字资本剩余价值最大化。

空间维度上，数字资本通过生产场域拓宽等方式间接延展生产时间。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资本家已不满足于仅在既定的工作场所对生产主体进行剥削，而是通过巧妙重塑生产活动的空间生态，竭力拓宽生产场域，为资本增殖寻求更多增量。就实体空间而言，数字设备的发明与普及为数字资本增殖带来机会，劳动者的生产地点能由工作场所向非工作场所转移，于非工作场所同样能够进行生产工作，并在此过程中为数字资本生产剩余价值。除实体空间外，数字资本也将目光锚定数字空间，不断扩张数字空间生产版图。数字空间同样存在完整的数字生产体系，它是人类利用数字技术建构的虚拟空间，人类通过数字劳动完成数字空间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活动。数据是数字空间的原材料，数字空间的核心建构者即用户进行数据生产劳动，不断建构数字空间体系，而其生产的数据被传回具备数据管理功能的数字平台，数据的分配过程在此完成，数字资本家将作为原材料的数据进行整理加工，从中提取具备使用价值的信息，将其转化为数据商品进行交换活动，出售给其余资本家以获取交换价值，而其余资本家则获得数据商品的使用价值，以海量大数据襄助其进行策略制定等行动，完成对数据商品的消费活动，数字资本的增殖运动也由此在数字空间中完成。在此过程中，生产时间在实体空间与数字空间等场域的拓宽中得以延伸，并最终完成数字资本的增殖活动。

（二）时间宰制：数字权力对时间体系的系统规训

数字权力是“数字时代依赖于数字技术而产生的新的权力形态”^[28]，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数字权力通常与数字资本合谋，构成控制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规训”，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29] (P232)}，而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体系则从不同维度被数字权力系统规训，形成对时间的宰制。

第一，对劳动时间的秩序规训。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劳动过程变得更加灵活与可监控。远程工作、项目制工作与零工经济逐渐兴起，使得数字劳动时间脱离传统工作日的束缚，显现出更为连续与碎片化的趋势，也由此生成依托于数字平台发展的新职业，即“数字零工”，如外卖员。“数字零工”依托于数字平台进行劳动，而数字平台在雇佣关系中占据强力支配地位，它将“数字零工”卷入平台时间体系，以算法权力和数字监控为规训工具，以时间倒数等方式对“数字零工”

的劳动时间进行秩序规训，规定其劳动时间、工作路线，甚至训练其仪表样态，确保其能够按照既定秩序完成平台任务，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其规训机制。面对数字平台，“数字零工”必须时刻“在场”。“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8] (P159)}，其劳动彻底降格为谋生手段。他们不断进行自我剥削，同时也被困于平台秩序。另外，数字平台通过佣金、抽成等机制，疯狂吮吸“数字零工”在劳动时间内创造的剩余价值，以此完成对“数字零工”的剥削与宰制。

第二，对自由时间的意识规训。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资本的渗透较以往更为隐秘，其通过制造影视、直播等具备视觉化、娱乐化特征的数字景观，广泛吸纳主体的自由时间，以此完成主体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景观认同，并为其提供合法性辩护。然而，这些数字景观内嵌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西方思潮，实质上是资本逻辑控制下的虚假幻象，正如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指出的：“景观就是积累到某种程度的资本，这时它就成了图像。”^{[30] (P15)}它是资本的视觉化存在，并通过这种存在方式不断对主体的需求、价值、认知等进行解构与重构，以历史虚无主义等不良思潮麻痹主体，使其娱乐至死，以此规训主体的精神世界。另外，数字景观不断生产同质化物象，并在此过程中对主体意识进行规训。韩炳哲指出，信息化时代同时是严重同质化的时代，“同质化的恐怖席卷当今社会各个生活领域……人们堆积信息和数据，却未获得任何知识……数字化的全联网和全交际并未使人们更容易遇见他者”^{[31] (P4)}。数字景观带来他者的消失和同者的强化，主体面临同质化事物更缺乏思考性，容易被同质表象蒙蔽，并在此过程进入“信息茧房”，致使其经验视野日渐狭窄，逐渐丧失理性与主体性，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附庸，同时导致主体自我意识的消弭。

第三，对社会时间的隐匿规训。社会时间是社会主体之间的时间，不同主体依靠社会时间进行社会行为的协调与合作，以此完成社会形态的建构与完善。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权力要求更强力而隐匿地对社会时间进行规训，以此更高效地榨取社会时间的剩余价值。数字权力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制定了特殊时间表与相应行为框架，并持续施加集体性、连续性与强制性节奏，如通过数字工具监视主体的劳动时间与劳动状态，并制定相应奖惩措施对主体行为进行规范，由此形塑社会时间与主体行为。此外，数字技术的便捷化与高效化加速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不断加速主体生活节奏，改变主体行为方式，使主体行为满足数字资本的增殖要求，不断实现“对生命主体的规训”^[32]，而属于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肉体由此诞生，这种肉体“是一种被权威操纵的肉体，而不是洋溢着动物精神的肉体，是一种受到有益训练的肉体，而不是理性机器的肉体”^{[29] (P166)}。换言之，它是被资本时间秩序彻底规训的肉体，是符合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时间系统运转的肉体，完美契合数字资本的增殖需求。

总体来看，时间重塑与时间宰制共同构成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双重驱力，既完成了对生产时间的时空再造，又对时间体系进行了系统规训，借助双重驱力机制提升时间剥削的强度与效度，实则反映出资本逻辑对个体时间维度的深度异化与掠夺，严重侵蚀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根基，凸显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时间分配机制背后隐藏的结构不公与价值扭曲。要破除时间剥削困境，必须坚持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批判，积极寻求时间剥削的解放进路。

四、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解放进路

在资本作为总体性结构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时间剥削与数字资本增殖规律具有内在一同性，时间遵从数字资本增殖需求运转，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被数字资本宰制与剥削。在此背景下，如何破除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实现人类社会的时间解放，则成为关键问题。必须坚持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批判，科学认识时间解放的物质基础、根本要求与必然归宿，以此探寻时间解放的可能性。

首先，大力解放和发展数字生产力是时间解放的物质基础。时间解放本质上是生产力的解放，

生产力的高度解放为时间解放奠定物质前提。当前，“以数据生产和控制为基础的数字生产方式”^{[33] (P365)}正在逐步代替传统产业生产方式，成为人类社会主流的生产方式，展现出解放人类生产力的巨大潜能，其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生产活动自动化、智能化，促进人类社会交换活动与分配活动高效化、精确化，增强人类社会消费活动个性化、便捷化，总体上提升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效率，持续改变人类社会的时间结构，为实现人类社会的时间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生产力基础。以数字生产力的最新发展成果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例，它依托于神经网络算法，以大量数据为基础，在运算中将诸多节点融为一体，协助人类按其需求分析海量信息，通过算法运作与数据处理等机制为人类生成合乎理性与逻辑的解答，增强人类在信息获取与整合方面的自主权，有助于解放人类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为人类社会的时间解放带来巨大助益。因此，必须大力解放和发展数字生产力，构建并完善发展数字生产力体制机制框架，强化数字核心技术研发投入，鼓励颠覆性技术创新实践，从而时刻把握数字发展的战略主动权。要加速数字产业化进程与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以此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体系层级，持续提升数字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效能。同时，要契合世界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宏观趋向，紧密追踪国际数字技术前沿动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生态。要助力发展中国家开展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积极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强化在全球数字领域的话语权与主导权，积极推动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进而重塑全球数字经济格局与治理范式。

其次，变革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时间解放的根本要求。数字技术本身是人类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先进表现，其中蕴藏着人类时间解放的无限潜能，当它被嵌入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则为资本增殖服务。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特别指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的雇佣关系与剥削关系。在这一关系下，数字资本控制时间结构，进而控制人类，使人类按照资本逻辑控制的时间结构进行生产活动，不是人类改造时间，而是时间规训人类，人类的数字劳动表现为资本的劳动，人类的自由时间表现为人类的资本时间，人类反而成为时间的奴隶，同时间的关系完全颠倒。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而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25] (P244)}从本质来说，数字资本主义的各种要素都为人类时间解放奠定了基础，如数据作为生产资料具有共享性特征，数字平台作为中介具有集约性特征，数字化生产作为生产方式具有高效性特征，它们都是先进生产力的表征。马克思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8] (P182)}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孕育数字资本主义的扬弃，这要求破解时间的资本主义应用，摆脱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得时间挣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桎梏，将人类和时间的角色再次颠倒过来，克服“时间结构控制人”的必然性，从而转化为“人控制时间结构”的必然性，实现人类真正的时间解放。

最后，建构数字社会主义时间范式是时间解放的必然归宿。数字社会主义不再以数字资本的增殖为根本目的，要求祛除对时间的剥削与压迫，建构数字社会主义的时间范式，真正实现人类社会的时间解放。一是推动数字技术赋能，高效塑造多元时间利用机制。数字技术具备强大整合与优化能力，要通过先进的数字技术与缜密的制度架构设计，全方位驱动数字技术融入并赋能社会时间体系，消解传统时间结构的离散性与局限性，摒弃数字资本主义时间体系的剥削性与压迫性，实现对数字社会主义时间体系的系统性重塑。要通过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技术，深入渗透至数字社会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关键环节，达成精细化、智能化的系统管理效能，由此显著提升社会运行的整体效率，推动时间利用的高效化、均衡化进阶。二是发展平台经济，强化数字平台监督。建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平台经济”^[34]是数字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平台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能够进行互动。”^{[35] (P50)}数字平台作为数字基础设施，连接海量社会主体，无形中已经掌握强大数字权力。部分数字平台通过算法等技术不断强化“数字零工”等数

字劳动者对数字平台的依附，并由此加紧对其劳动时间的控制。因此，必须强化对数字平台的监督，完善数字平台管理相关机制，引导数字平台合理安排工作时长，监督数字平台相关法律落实质效，建立符合平台经济健康发展需要的劳动关系，切实维护数字劳动者的时间权益。三是注重自由全面发展，重塑时间价值导向。同数字资本主义相比，数字社会主义的时间价值不再单纯以经济效益创造为标准，而是更注重时间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维度的意义。因此，必须转变人们的数字认知与时间观念，引导大众认清数字资本逻辑控制下时间剥削的本质，破除技术拜物教桎梏，帮助大众积极树立自由时间观念，“真正将自由时间作为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时间”^[36]，主动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12] (P258)}，不断进行创造性活动，充分发挥自身潜能，真正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杨立平,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 [2] [美]丹·席勒.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网络与尼克松时代[M].翟秀凤,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3] 邓观鹏,顾友仁.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本质意涵与批判超越[J].经济学家,2024(11).
- [4] 于天宇.时间剥削与情绪剥削——平台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23(1).
- [5] 陈道武.数字资本主义批判视角下的时间重构、加速与自由[J].江淮论坛,2024(2).
- [6] 郭浩哲,张思军.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新形态的困境与超越[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10][美]罗德尼·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M].吕梁山,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4]蓝江.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
- [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6][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 [17]刘少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伦理的运行机制理论及其现实启示[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
- [18][日]松冈真宏.未来时间使用手册[M].张瑞婷,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
- [19]吴鼎铭,胡骞.数字劳动的时间规训:论互联网平台的资本运作逻辑[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
- [20]徐昕.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意识形态批判[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
- [21]马辰龙.“社会工厂”境遇中数字资本权力的时间规训:困境及其克服[J].社会主义研究,2024(2).

- [22] Terranova, T.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J]. *Social Text*, 2000(1).
- [23] Fumagalli, A., S. Lucarelli, E. Musolino, et al. Digital labour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The case of Facebook[J]. *Sustainability*, 2018(6).
- [24] [英]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M]. 周延云,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 [2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 [26] 宋建丽, 王仪. 数字资本主义的自由时间困境及其超越[J]. 世界社会科学, 2024(3).
- [27] 姜英华. 数字资本的时间变构与时间规训及其异化后果[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
- [28] 李红权, 赵忠璐. 数字权力的兴起、扩张及治理[J]. 江汉论坛, 2023(9).
- [29] [法]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 [30] [法]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M]. 张新木,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31] [德] 韩炳哲. 他者的消失[M]. 吴琼,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9.
- [32] 于天宇, 王帅帅. 资本逻辑批判与生命逻辑建构——乔尔·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生命政治意蕴[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
- [33] 蓝江.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哲学反思[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
- [34] 冯明宇. 平台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审视——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性”为线索[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 [35] [加] 尼克·斯尔尼塞克. 平台资本主义[M]. 程水英, 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 [36] 于萍, 马湘芊. 马克思生态休闲思想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Time Exploitation of Digital Capitalism and It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IE Jia-qi

Abstract: In *Das Capital* and its manuscript, Marx,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expounde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capital controls and exploits the life time of laboring individuals, unravelling the “time mystery” of capital movement. With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m, the time exploitation of digital capital has taken on multiple forms. It has not only increased the exploitation of labor time through new methods such as precise control, fragmented possession, and blurred boundaries, but also strengthened the exploitation of leisure time of different subjects such as “digital technicians” and “digital crowds” through digital labor. Digital capital reconstructs production time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ime and space, and digital power systematically disciplines the time system from the dimensions of social time, which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dual driving force of digital capitalism’s time exploitation. To break the dilemma of time exploitation, it is imperative to vigorously liberate and develop digital productivity, transform digital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 construct a digital socialist time paradigm, thereby realizing the true liberation of free time for human society.

Key words: digital capitalism; time exploitation; labor time; leisure time; time liberation

(责任编辑 孙洁)